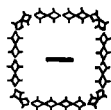


学术动态三则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三次小型研讨会侧记



1987年11月中旬,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有学会顾问诸葆一、会长郭吴新、副会长陈宝森、秘书长郑伟民、副秘书长相思正,部分学会理事和有关单位代表共35人。会议由郭吴新、陈宝森主持,主要就西方股票市场大动荡的原因及其影响、里根后美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和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最近一次西方股市大动荡的原因及其影响问题

代表们指出,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中下跌508点,跌幅超过20%,并由此引发了整个西方国家股市的大动荡。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应作具体的分析。

近几年来,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各方面的矛盾日积月累是导致“黑色星期一”的根本原因。

首先,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遇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过后,其经济已连续5年低速增长。80年代上半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尚不足3%,企业长期开工不足,设备利用率不到80%,投资不振,非住房固定资本投资1986年甚至绝对下降2.8%。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一方面严重动摇了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又使大量相对过剩资本涌入金融市场,进行股票投机。加之近年来美国企业兼并之风日甚,大宗股票频频倒手,股市愈炒愈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由1982年8月11日的776.91点持续升至1987年8月25日的2722.42点,5年中上扬2.5倍。股市上涨严重脱离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基础,种下了这次股市狂泻的祸根。

其次,美国政府持续扩大军费开支,同时又把减税作为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手段,一方面财政赤字随军费的增加而膨胀,另一方面减税又并没能刺激投资的增加,结果联邦财政连年亏空,赤字剧增。1986年高达2207亿美元,1987年也仍将保持在1800亿美元左右。虽然国会已通过了预算平衡法案,但由于受各方面的制约,美国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回旋余地有限,1988年度的财政赤字预计仍在1600—1700亿美元之间。公众对美国政府改善财政状况,削减财政赤字信心不足。

第三,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不断恶化,外贸逆差越来越大。1982年为427亿美元,1981年骤升为1486亿美元。虽然美国一再将其原额外贸赤字归咎于美元汇价过高,但自1985年9月以来,美元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货币的汇价已大大下调,而期望中的“丁”效应并未出现,1986年美国的外贸赤字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又升至1700亿美元。据专家们估计,1987年,美国的外贸赤字将接近甚至超过1986年的水平。

“孪生赤字”迫使美国需要大量吸收外来资金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1985年和1986年,美国的外资净流入分别为1100亿美元和1400亿美元,美国已经论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就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这对股票市场价格必然会发生直接的影响。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看到股市大动荡的根本原因的同时,还应对一些诱发因素予以充分的注意。

第一,利率的提高。1987年9月初,在美国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由8.75%提高到9.25%后,西德也将其利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美国财政部长贝克马上发出威胁说,美国不会坐视贸易盈余国提高其利率,使世界经济速度减慢。所谓“贝克讲话”加剧了公众对美国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的担心,致使投资者纷纷逃离股票市场。

第二,美国的外贸逆差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1987年7月和8月,美国的外贸逆差分别为164.7亿美元

和156.8亿美元。巨额的外贸逆差本身就意味着美元的地位将继续不稳，而贝克又公开宣称要使美元对西德马克的比价再下降30%，就进一步动摇了公众对美元的信心。加之美国同其盟国在利率和汇价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使投资者对国际协调失去信心，因此纷纷从股票市场转移资金。

此外，西方股票市场的电子计算机程序交易，全球性的计算机联网交易系统和其他市场投机因素以及海湾局势紧张等等也都是诱发这次股市大动荡、加剧其程度、使其迅速蔓延的一些重要因素。

与会代表认为，尽管这次股市大动荡来势凶猛，但不会由此引起类似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主要理由有四点：（1）1929年美国经济增长过热，生产过剩矛盾激烈。而现在美国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市场矛盾同当时状况不一样；（2）1929年危机年代，由于债务连锁效应，导致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崩溃，而现在有银行存折保险制度，构成了一个“安全网”；（3）1929年在银行和企业最需要资金的时候，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紧缩信贷，卡断了资金供应，而现在联邦储备银行是保证扩大资金供应，从而能防止整个经济的崩溃；（4）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控制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远非1929年时可比。在严重经济衰退的威胁面前，各国必然会相互妥协，力图减少经济的震荡，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

关于这次股市大动荡对近期内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体上有三种意见。

一部分代表认为，从1973年5月至1982年11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直未超过历史最高点，其后的回升带有一定的补贴性，只是近年来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才出现暴涨。暴涨必有暴跌，因此，这次股市暴跌可以看作是市场对股市超常暴涨的强行修正，不会对美国的投资和消费产生过于强烈的影响。美国经济仍将循其低速增长的轨道发展，经济衰退不会因此加速到来。

另一部分代表认为，不能低估这次股市暴跌的影响。他们指出，美国现有5000多万人握有股票，他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总是依其财产的期望值来实施其经济行为的。股价暴跌，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产瞬时消失，必将对私人消费乃至投资欲望发生抑制作用。况且，联邦储蓄当局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必将影响到通货膨胀，促使美元地位进一步虚弱。所有这些都可能加速下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促使其更为深化。

第三种意见认为既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股市暴跌的冲击作用，又要看到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的，因此对这次股市暴跌是否会加速下次经济危机到来还不宜过早作结论，尚需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观察。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我国目前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较低，范围有限，这次股市暴跌对我国经济尚无明显的直接影响，但必将发生一些间接影响。这些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对外商品出口，劳务贸易和利用外资等方面。

二、关于里根后的美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和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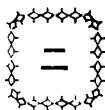
代表们指出，总的说来，里根的国内经济政策既反映了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的主张，又保留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大杂烩。其对外经济政策则一贯坚持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压西欧、日本让步，对美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也作些妥协，注意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对经济进行国际干预。在美国经济的继续低速增长已成定局，而且两大赤字、内债外债膨胀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条件下，考虑到1988年又是大选年等政治上的因素，里根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不可能有大的变动。里根后无论哪个党上台，应付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和解决两大赤字及内外债务问题，都将是下届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可以预计，里根后的美国政府运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措施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将更为加强。美国的产业政策也得作新的调整，一方面将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西欧、日本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也将比较注重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在“战略防御计划”的总体进程不至于受到影响的前提下，美国的常被军费可能有所减少，军费的增长速度有可能稳中见降。下届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可能是一方面加强对西欧、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渗透，另一方面将更加注意经常性的国际协调，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加强超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

总之，今日的美国经济无论从国内看还是从其国际经济关系看，都离不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干预和调节。至于今后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具体的财政、金融、税务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这些都要视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情况而定。

代表们一致认为，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美国既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

一, 又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我国对美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 占出口总额一半左右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又受到美方苛刻的配额限制及原产地限制。因此, 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美出口, 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势在必行。从美国对我国的投资看, 虽然在投资额上, 美国次于港澳地区和日本而居第三位, 但美国对我国的投资多是直接投资, 且一般都直接带动新技术的转让, 其中还不乏如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等大项目。因此, 扩大引进美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对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利的, 现在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在改善投资环境上狠下功夫, 为引进美资创造条件。

代表们指出, 今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放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发展中美经济关系有利于两国经济建设, 对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无论从中美双方各自的经济利益, 还是从国际政治方面分析, 中美经济关系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和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于1987年11月中旬在江苏省镇江市联合召开小型研讨会, 主要讨论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问题。会议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薛敬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和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蔡述理主持, 与会代表38人。

代表们认为, 二次大战后,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的规律仍发生作用, 但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非周期性因素对周期的平抚日益成为经济进程中的经常现象。因此应将二者综合起来考察。

关于战后经济危机与周期的特点, 有的代表认为, 应以七十年代初前后为转折点。在此以前可概括为: (1) 危机频繁、不稳定性加剧; (2) 周期延长; (3) 周期性危机不大深刻、危机后复苏强劲; (4) 世界性危机的同步性减弱。在此以后可概括为: (1) 工业生产增长率显著放慢; (2) 经济周期出现缩短倾向; (3) 周期性危机比较深刻, 危机后复苏缓慢, 高涨期短而乏力。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战后经济危机与周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 危机的周期性明显加强; (2) 经济周期延长; (3) 危机的严重程度减轻; (4) 历次危机中没有伴随着严重的周期性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

有的学者还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历史考察, 提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两种周期波动的观点, 认为现实的经周期是这两种经济周期综合发生作用的运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 出现了上述两种波动重合的现象, 即同长波动相应的周期性危机和同短波动相应的中间性危机在危机深度上平均化的现象。

代表们认为, 导致经济危机与周期在战后时期的变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1) 战后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加速了固定资本的更新, 对周期波动产生了强劲的熨平作用; (2) 战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强化了国家垄断机制。一方面缓和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突, 另一方面促进了国际协调的发展, 致使战后世界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同步性加强, 但波动幅度受到了一定控制。

有些代表指出,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波动的主要指标不应是工业生产水平及其涨落, 而应考查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如仅以前者为分析的依据, 则经济的波动应称之为“工业危机及周期”。其主要理由在于, 目前发达工业国家里, 第三产业产值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5%—70%, 而工业生产总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时第三产业产值增长还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等特点。因此, 划分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基本经济指标显然不宜再采用工业生产指数, 而以改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减到较为科学和全面。

个别代表还根据康德拉基耶夫的长波理论, 预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将进入长周期的上升面, 并认为,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等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必将迎来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世界经济的新的繁荣。

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的同时, 有些代表还提出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周期运动规律和什么是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法定性因素等重大理论问题, 开展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委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邀请部分学会理事、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界人士, 于1987年11月下旬,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了美国金融资本小型研讨会。会议由学会副会长刘传炎和学会理事章嘉琳主持, 与会代表二十人。学会副会长洪文达、陈宝森、秘书长郑伟民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会议就美国金融资本的组织形式即垄断财团的新变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代表首先对国内学术界关于垄断财团问题的研究作了简单的历史回顾,并充分肯定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尽管战后以来,美国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金融资本对美国经济的统治仍然存在。

在是否还存在垄断财团的问题上则存在着明显分歧。

持财团消失论的学者认为,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特点,使银行对非金融公司的控制有所减弱,控制的形式也有了改变,从而为垄断财团的渐趋消失创造了条件。他们列举了三方面的具体论据。

第一,战后美国生产集中和经营多样化的发展,打乱了原有的财团格局,使财团逐步丧失了专业化的特点,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大大加强,促成了垄断财团的群体。

第二,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个人和家族财富的积累受到一定的限制,家族式的组织已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至此,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家族战后都由盛而衰,相继退出了经济活动,推动了垄断财团的解体。

第三,战后,资本国际化大发展,其结果是使美国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削弱了美国银行对国内企业的控制,加速了垄断财团的解体。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尽管二次大战后美国金融机构掌握的信托资产大为增加,但是,随着美国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股票发行数量空前增多,持股越来越分散;由于股票交易方面的变化,金融机构无法进行长期股票投资,从而使它更加难以通过持股来控制企业;金融公司购买公司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了干预公司的日常活动、控制公司,而是为了取得红利,况且,近年来购回自身股权,摆脱外部控制的公司也在逐步增多,如此等等,都使得通过持股控制工商企业的作用大为减弱。同时,他们还指出,由于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利益交叉,相互依赖,公司间人事结合的作用也有了改变,兼任董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备控制权,而只是起协调作用。据此,这部分学者将银行不再能通过持股控制工商企业和互兼董事作用的变化,视为财团解体的标志。

另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财团消失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研究美国金融资本的组织形式即垄断财团的变化,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财团”这个概念的准确内涵。他们指出,在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发展过程中,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通过持股、互兼董事和信贷关系等途径相互溶合生长即形成为金融资本,掌握着金融资本的金融寡头结成的集团即为金融资本集团。金融资本集团的英文原文为 Financial Capitalist Group,旧译为“财政资本集团”,通常简称为“财团”。可见,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溶合生长是“财团”这一概念的准确内涵。从这个内涵出发,只要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溶合生长没有停止,只要由此而生的金融资本还是为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所控制,只要这些金融寡头还在借助各种途径结合在一起,就必定会有财团存在。从现实的美国经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看,上述事实都是客观实际,因此,关于财团已经消失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持财团存在论的学者还指出,财团家族色彩的淡化,财团经营多样化,财团间的相互渗透,银行垄断资本同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溶合途径的转变,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带来的二者在国际范围内的溶合生长等等,都只是在新形势下垄断财团发展的新特点,而不应视为财团消失的标志。

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在研究分析生产集中与垄断问题时,不应把生产集中与垄断简单地机械地联在一起。认为,生产集中应区分为部门集中和社会集中,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部门集中容易导致垄断,社会集中则难以推出垄断的结论。并进而指出,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集中提高很快,而部门集中提高不快,因而对于垄断是不是现代美国经济的基础的问题应重新估价。

与会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分清部门集中和社会集中的必要性,也都同意在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关系问题上应抛弃简单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他们指出,战后美国的部门集中与社会集中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集中与垄断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况且,所谓社会集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垄断财团的经济控制,因此,社会集中难以推出垄断的结论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周文贵)